

中山大學與我

謝扶雅

戴傳賢校長的性情

國民政府在大陸時代的國立中山大學，位於廣州；它的前身是由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昇格而來的廣東大學。由於 國父曾於民國十三年在廣東大學作了一連串的三民主義演講，後來即為紀念此事，而改廣大為中山大學。迨北伐成功，一度出現了國立第一中山大學於廣州，第四中山大學在南京，第三中山大學在武漢。以後又將南京的第四中大，正名為國立中央大學，而廣州的第一中大，又改回為國立中山大學。我和中大第一次發生關係，是在它前身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的時候。其時廣高的校長為金曾澄（湘帆）。為了他和我是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先後同學的關係，故於民國十一年之秋，曾邀聘我去任教國文。但我那時供職於上海的全國青年協會，不能擺脫，故未曾應邀南下。廣高經廣大而成立中山大學時，第一任校長為戴傳賢（季陶），副校長為朱家驊（驥先）。大概由於驥先曾在北大教書的關係，拉了北大出身的傅斯年來長中大文學院。我那時由留美回至廣州，已應了那間有教會背景

嶺南大學之聘，却也做了一些兩大學生開相互辯論會之類的工作。而我自己，亦曾應邀在中大禮堂作了一次講演（記為民國十八年的四月一日），由戴傳賢季陶校長主席。講演後，與若干教授們茶點，我乘間問戴校長：對剛纔我所講的（註一），校長有何指教與批評。戴氏笑說：都很好，不過講得太緊張了一點。季陶先生以一恂恂儒者，而又佛學修養工夫高深，況當時中國時局，北伐大體已告成功，廣州後方十分安定，自然感覺到我在這樣一間高等學府裏的講演，不免過於激越。

想不到恰巧那年的冬間，廣州發生了一次不小不小的赤亂，即是在某晚，駐穗市的一個教練團叛變，瞬即攻佔了公安局。全市除了東山區而外，悉入赤軍之手。那日正逢週末，我由對岸的嶺南大學回至市區南關寓中，入夜即聞槍聲大發，附近的廣東省銀行起火燃燒至翌晨未熄。我屏息至下午，拿了一些簡單的衣服書物，走向西關第十一甫一個親戚的家中去暫避。却在第十甫的內街撞到三名頸纏赤帶的流氓樣男子，用短槍指準我咽喉，我時魂不附體，任其搶去行李，而免

於難。不過在第三天早晨梳洗時，忽然髮如雨下，散滿一面盆。要不是那時壯年頭髮旺盛，否則馬上成了一個禿頭的青年教授了！

我推算當時，今副總統謝東閔正在中大法學院（由前之省立法政專門學校改成）肄業。不知他那時會受到怎樣的驚慌？中大學生多半住在校園或附近的幾所宿舍。但戴校長和朱副校長，則皆住在東山區百子路的中大醫學院及其附屬第一醫院，那裏一帶都很平靜，沒有任何軍政機關駐在。中大教職員及眷屬亦大抵寓在東山住宅區，皆未遭亂事波及。但傅斯年院長和若干北來的教授，因外省人言語不通之故，心中恐懼，故雇小艇渡河而至對岸的嶺南大學招待室和校友會宅小住了好幾天，我們因而更有暢敘的機會。亂事平息後，赤軍屍橫街道壘壘，一時未遑收拾，連章席都沒有把屍體掩蓋，季陶先生於巡視市區，目擊這種慘象，曾埋怨當時維持地方治安的官吏，任聽如此暴屍通衢，不急急救埋。阿彌陀佛心腸的季陶先生，自更感覺到這種像前清處決死犯，往往梟首示衆的野蠻舉動，反更養成一般民衆的殘忍心理吧。

鄒海濱校長的作爲

中大第二任校長爲有名的西山會議派之一黨國要角鄒魯（海濱）。他是廣東大埔人，聘用了他的一位小同鄉古直（公愚）爲中國文學系主任。古氏是前清八股出身的老先生，反對白話文甚力。時廣東行政首長陳濟棠，正與湖南省府主席何鍵相爲提倡在學校裏「讀經」，惹起了嶺南大學我的一個同事陳序經教授寫出一篇「全盤西化論」的長文，去響應北方的白話文學革命與新文化運動。其時香港大學計劃新設漢文學系，擬禮聘北大胡適（適之）南來主持其事，故先贈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給適之。適之於民國二十年由平至港接受這個名譽學位，並推薦許地山（落花生）到港大掌漢文系務。適之自港轉入羊城，中大一般學生自然早飽聞了這位西化大師胡博士的聲名，而欲請他到校講演，却被學校當局出告示禁止。據說鄒校長這道嚴禁告示，是由古公愚主任所手擬，中有胡適提倡歐化，毀滅祖宗遺產，不啻「認賊作父」的字樣。

這時洋化的嶺南大學，正好對胡適表示十分歡迎，却也相當懼於保守國粹的省政府之威勢，不敢請胡氏公開講演，好像故意對中大唱反調，於是只開了一個茶話會（露天），邀約一部分教授和少數學生領袖和胡氏見一見面，隨便談談作罷。嶺大的課程中，遵照部定，全校學生必修「三民主義」一課，向聘中大一史學教授陳安仁（國民黨員）來校兼任。他仰承省府和中大當局之意旨，力主保存國粹，與上述倡導全盤西化的陳

序經教授，在言論思想上發生正面衝突，常在嶺大校報上彼此寫文「抬槓」。我是一個批判折衷主義者，每爲「二陳」作和事佬。我說：讀經未嘗不可以，只看「怎樣讀」法是了。其時廣州有一份官方刊行的「民國日報」，主編副刊（註二）者爲一外省人厲廠樵。中大一些教授與高年級學生之能文者，常爲該副刊寫學術性的文章，或評論時事。我也是經常投稿人之一。今夏我旅行費城，偶遇一素不相識的中大老學生，經友人互爲介紹之下，他驚喜地告我，他從前在廣州民國日報副刊上讀過我不少文章。光陰真如白駒過隙，一霎眼便是半個世紀！異域相逢，自不勝其感慨！

中大的校址，本在廣州市東區文明路，原由前清時代的鄉試考場改成。地面雖尚寬敞，而屋宇則甚粗陋。鄒校長身兼省府委員之一，很容易弄到市郊（東北數十華里外）石牌一大塊，不下千畝之多的地皮；於是大興土木，鳩工庀材，經營了兩三年之久，數十棟夏屋渠渠，氣象萬千，成爲亞東最廣大之一校園。時學院已由文、法、教育三學院擴充至十餘，學生亦由數百增至數千。我無意於此——亦不可能遍查統計資料，不過將三十年代前後十餘年間的中大粗述梗概及大體演進的過程，給讀者一點粗大輪廓而已。

抗戰時期幾度播遷

我和中大第二次發生關係是於抗日戰爭期間，有一年（民國廿九年度）我曾拜命長文學院及文科研究所。抗戰發生兩年後，廣州危急，中大

由海路疏散，西遷至雲南激江，旋以粵省政府尚在粵北曲江，而第四戰區總司令部亦在韶關一帶駐有重兵，日軍似無由穗北侵的跡象，故中大決定再由滇改移至曲江附近之碎石。鄒海濱已於先一年辭校長職，教部改聘已卸職粵省府教廳長之許崇清出掌中大校政。時文學院院長吳康已離職它去，疊催不回。碎石爲一大鎮，但亦無法容納中大十數學院。各院不得不分頭在附近四周村鄉尋覓棲身之處，文院因院長無人，隨便被指定搬往一極窮僻，叫做清洞的小村子，假該村的村公所作辦公室。另覓兩間極簡陋的屋子，略加修葺改造，分作學生宿舍及課堂。同時又向各村民商借騰出餘屋爲教職員租住，因陋就簡，勉安一時。

我於抗戰前夕，已拋棄大學臬比，投入農民教育與鄉村建設的行列。武漢保衛戰時，我在湖南襄助省府創辦地方行政幹部學校，調訓各縣長科長鄉鎮長，以及組訓民衆等工作。長沙大火後，乃入西川，協助晏陽初氏籌備開辦鄉村建設學校。旋以眼疾嚴重赴港就醫，順爲其時由穗遷港，借港大上課的嶺南大學主持學生輔導事宜。但我早料到日本必將發動西南太平洋戰事，力促嶺大離港遷入內地不獲，只好自己飛往桂林，爲桂省從事戰時教育研究實驗；不久即爲中大大文學院長一缺虛懸已久，應邀循湘桂陸路轉粵線而至曲江又從碎石折入清洞，趕辦文學院民國廿九學年度秋季開學事宜。由於兼任哲學系，故除處理院務外，尙開講西洋哲學史及哲學概論兩課。我察看清洞實太荒僻，即採辦食物亦需赴二十餘里外之一小鎮，而距離校本部之碎石則更越四十里

之遙。碎石因在粵漢線之一市站，尚有數處電燈及校本部一電話，清洞則洋油燈都缺乏，入夜鬼火黯淡，雞犬聲亦寂然。位置一個大學的學院，勢所不宜，非急覓地它遷不可。

適見離碎石車站兩里外之鐵岡，有一廣東省銀行舊設之倉庫兩大間及主事者辦公室兼臥房一小棟，建築皆為新式，但廢置不用已多年，窗戶多脫落，如能稍加修理，即可為本院相當理想之戰時院舍。恰巧我和省銀行雲行長熟識，乃即前往該行（在曲江郊外自建臨時數間木屋竹棚），商得雲氏慨允讓贈。於是在民國三十年之第二期開始，師生全體動員，由清洞搬至鐵岡上課。雖則全院學生（四系約共三百人）皆在兩大通間內地板上排列打舖而臥，但因木質甚佳而厚實，地勢又高，不虞窪濕，時屆初春，不寒不暑，而又無蚊蚋，不用蚊帳。女生「宿舍」則另佈置於膳廳之一傍。因與碎石幾為近隣，故師生於課暇多往碎石消遣遊樂，調劑身心。碎石爾時建設已相稱於一小縣城，中大校本部則儼成為文教中心的模樣。

中大於抗戰末期，復因韶關告警，而再北遷至連縣，時許崇清因病辭校長職，一度由張雲教務長兼代，最後由中大前身廣高舊校長金曾澄來長中大，以至抗戰勝利復員。但我已於民國三十年之秋初，移帳至湖南藍田國立師範學院。該學院教授什九為江浙人氏，在言語生活習慣上，與中大迥然不同。而藍田國師於戰時新設公民訓育系，廖世承院長堅邀我承其乏，不便固辭。今日旅台國師同學數達二百餘人，多居文教要津，尤

以新在南雄成立國立師範學院，與當年湘中國師後先輝映，而今台南師院的院長又為四十年前湖南師院教育系之一畢業生，允稱民國高等教育史上佳話云。

勝利復員及淪陷後

中大復員至廣州石牌原址後的情況，我幾毫無所知，因我遲至民國卅五年夏，始得由渝隨國立編譯館的復員而抵南京，是年秋，又兼任金陵大學全校必修科之倫理學教課，軟筆繁勞，不遑聞問南方情事；而首都局面倏因共黨滲透，人心浮動，青年學子飽受虛惑，頻聞罷課示威遊行風潮，瞬即蔓延全國，湖南國師亦遂波及。二十年前曾任中大副校長之朱驥先氏，時正長教育部，鑒於湖南國師院長出缺，令調中大理學院院長康辛元（湖南衡山縣人）回至原籍去掌國師院務，奈該院學生藉口康氏係一科學中人，不解師範教育為由，罷課拒康。朱部長乃促我前往處理，我乃暫攝院篆兩月有餘，以待教部另易陳東原參事為院長後，始返首都。爾時金圓券潮駭盪，徐蚌戰事敗績，南京搶米潮颺起，使秩序益難維持。先室因蔣夫人所辦婦委會之開始疏散，而受調回粵擔任廣東婦委會分會總幹事職務，由是我們全家離粵經滬南下。我到廣州後，再在我的老學校嶺大任教，乃有機會走訪石牌之中大，時掌校事者為我留美一老同學之陳可忠，曾相將與六七位教職員同進午餐，大家心事重重，較之十年前廣州淪陷於暴日「皇軍」之手的前夕，心情遙為沉慮；而一些不解事的學生，更隨全國澎湃之學潮四出

鬧事。逆觀大勢，事不可為，遂於民卅八夏挈眷離穗下港，自此即與大陸河山告別，以迄於今！中大末期的教務長王越，原為湖南國師教育系一教授，思想涉於左傾。廣州淪赤後中共亂改各級學校系統。嶺南大學因受「美帝」嫌疑，即被停閉，而在石牌之中大文學院，即被移至嶺大校址，成立中山大學，令許崇清為名譽上的校長，原嶺大校長陳序經（即上述曾倡全盤西化者）任副校長之一，而另一掌握全校實權之副校長則為一名高級共幹。嶺大不少教職員遭受清算或拘繫。嶺大的理學院與農學院，均已辦有研究所，其圖書及設備，則皆被搬運至石牌，併入中大理工兩院合成之華南理工學院與華南農學院。原中大之師範學院改名為華南師範學院。由是本為紀念國父而設立的中山大學，悉被肢解，而只在珠江兩岸留名一個中山大學於嶺大的校址，其編制及課程，已皆非我輩所知悉的了。

在台建校後的展望

國府自大陸撤退至台後，過去在大陸的許多官公私立大學，紛紛在台復校，中大遲至本學年度（民六九）始在高雄再得與世人相見。我上次自美回國觀光，特別約晤了中大籌委會主任，亦即今日的新校長李煥先生，承他出示中大教育計劃，並校園設計，為之極感興奮！我也於訪高雄時，過往中大新校址於西子灣，親見水碧山青，形勢壯麗，與在大陸廣州郊外平原之舊校校址相比，別有一番氣象。我到台中東海大學講學時，適又遇到正為中大新校舍起草藍圖的畫則師胡君，而

他恰正是抗戰時期中中大文學院的舊生。他原肄業外文系，但後來到它校改習建築工程，任教台南成功大學建築學已達二十五年。今為新中大規劃校園，可謂得人而慶。月前我從報端看見中大在西子灣開幕，先成立四個研究所，招收了若干研究生，配合這個復興基地建設的當前需要，培養真才實學的俊髦，光芒萬丈的前途，自可預卜！

我於上月忽然接得自大陸廣州中山大學寄來一信，拆視之下，上款稱「扶雅師座右」下署「生丁寶蘭」，內述他於抗戰期間在文科研究所「備承教誨（註三）」，而今備員中大哲學研究所主任；並言，因屢患心臟血疾，身心衰弱，經囑副主任袁佛時代為陳報中大哲學研究目前狀況云云。果然另有袁君寫的滿滿兩紙的一函，備述該研究所近正注重研究近代及現代中國哲學，極願獲得海外及港台有關這方面的一切出版著作；未了說及「現在的中山大學，辦在原嶺大的舊址，兩校的校友們不時到此地開會歡聚，聽到你年近九旬，精神矍鑠，假如明年方便回來講學，必定受到熱烈的歡迎！」對此「旌招」，當然我是不會去的。有人也許以為這些都不過是中共慣用「統戰」的玩藝兒，我不欲違對了袁這兩封信，即下此「誅心」的結論。事實上，近來美國許多大學收納了中共派遣出來的一些研究生，和此外各色各樣的考察代表團，他們——尤其是自然科學家，對一般我旅美學人，大都胸無城府，於政治不感興趣，有的還似有悔恨之心，為了他們都在「文革」中受過多少壓迫，或遭冷落。我們痛恨共產主義與毛澤東思想，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與暴力

革命，却並不與大陸民衆及一般知識份子為仇。無疑地，今日大陸，除了一小撮中共頭目及部分無知共幹而外，一般都已厭棄共產政權。我們海外學人正好趁此機會，對大陸來此研究的一羣青年知識分子加以坦誠聯絡，因為他們實在都不失為將來新中國建設的棟樑之器。

民六九、一二、九於美維州

（註一）我已不記所講的是什麼大概講題為：大

學生對當今中國的時代使命。
（註二）還記得名為「現代青年」。

（註三）其實，我不曾教過他，因我雖於抗戰時，文學院長例兼文科研究所主任。但我只為全所研究生講演過一次，而未曾對哲學研究所學生們授過任何哲學課程，戰時中大研究院另在清洞附近之一小村，許校長例兼研究院長。

大專 最新應用文

邵健行 著
定價壹佰伍拾元

本書為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：應用文的涵義、特質、種類。書信的種類、結構、術語。便條。明信片。柬帖。公文。電報。會議文書。規章。契約。慶弔文。對聯。題辭。啟事。廣告……等應用文範例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賬戶

中外雜誌社國外讀者服務部簡則

- （一）服務事項：1. 代購國內出版書籍代預約即將出版之書刊。2. 代訂雜誌。3. 代印文件。4. 其他有關文化服務事項。（二）代購書刊按臺幣售價計算郵費等按實際支付結帳。（三）歡迎海外讀者設立帳戶，凡以支票存本社美金伍拾元或港幣貳佰元即可開設帳戶，每半年按往來帳目結算一次。（四）在本社設有帳戶之讀者購買本社書刊，一律按定價八折優待。（五）來函及匯款請寄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中

外雜誌社收，英文通訊處為：KALIDOSCOPE MONTHLY
7-2 SHIN SHENG S. RD. SECD. 3 Taipei, Taiwan, Republic of China